

# 两汉今古文经之争新论<sup>\*</sup>

侯少博<sup>\*\*</sup>

## <目 录>

1. 利禄之争辨疑
2. 今文学家反对古文的缘由
3. 今文学家兼习古文之意义

刘歆提出将《古文尚书》、《周官》、《毛诗》等立为学官，遭到了诸位博士的一致反对。班固曾说：“盖禄利之路然也。”〔1〕这一观点得到了后代学者的认可，人们多认为，今文经学家反对古文学，是因为担心他们和自己争夺利禄。〔2〕然而，据史料记载可知，东汉学者的争论多在于义理方面。实际上，早期接受古文学的学者，如翟方进、刘歆等人，便是今文之学出身；而刘歆提议立古文学于学官，积极反对的今文经学家，也多是因为他们不肯改变师法，也就是不愿承认古文学的学理。正因为如此，东汉学者才有可能从学理上研究古文学，以便比较二者的高下。可以说，太常博士与刘歆的今古文之争，成为东汉经学义理之争的先导。

\* 资助项目：本文系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两周乐政与乐官的文学活动研究”（15CZW011）阶段性成果。

\*\*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 1. 利祿之爭辨疑

《漢書·劉歆傳》記載，劉歆提議立古文經學于學官，漢哀帝令博士與劉歆商議，諸博士不肯議對。劉歆於是作《移太常博士書》，批評他們是古非今，引起了軒然大波。反對劉歆之說最為激烈的學者，主要有龔勝、師丹兩人。《漢書·楚元王傳》記載：“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旧章，非毀先帝所立。”龔勝、師丹二人可謂反對劉歆的中堅力量。然而細觀二人行事，絕非貪圖利祿之人，試證明如下。

龔勝受業于薛廣德，兼通五經，尤以《魯詩》為長。漢哀帝即位后，龔勝被征為諫大夫，轉為丞相司直、光祿大夫等職。龔勝在任期間，多有匡正。漢哀帝祖母傅太后與馮太后有過節，陷害馮太后，令其自殺。孫寶奏請重新審查馮太后之獄，因而得罪傅太后，被漢哀帝下獄。龔勝和傅喜一同勸諫，使哀帝恢復了孫寶的職位。漢哀帝商議是否恢復惠帝、景帝的宗廟，大臣皆附和同意，唯有龔勝反對，認為應當依禮行事，從而得罪了博士夏侯常等人。據《漢書·龔勝傳》，王莽代漢之后，多次征召龔勝，龔勝稱疾不應征，對門人高暉等說：“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最終絕食而死。這些話或許有后人杜撰的成分，但龔勝不應王莽征召，名重一時，却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若是以這樣一位敢于直諫、忠于职守的儒生為利祿之徒，恐怕有違情理。

師丹學習《齊詩》，受業于匡衡。傅太后欲與母帝俱稱尊號，大臣多逢迎，聲稱“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漢書·孔光傳》）師丹認為，尊卑是人倫之序，不可廢棄，漢哀帝的父親已經謚為“定陶共皇”，不應更改。師丹根據《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的原則，“子亡爵父母之義”，堅決反對大臣之議，由此得罪漢哀帝。師丹后有小過，而被哀帝免歸故里。即便

如此，尚书令唐林上疏说师丹“经为世儒宗，德为国黄耆”，（《汉书·师丹传》）十分赞赏师丹的学行，建议汉哀帝恢复他的爵位。唐林为清名之士“数尚书谏正，有忠直节”，（《汉书·鲍宣传》）其辞应当不诬。这样的德高望重之人，也很难与利禄之徒并列。

总之，根据龚胜、师丹两人的学行来看，他们绝非因为利禄反对古文经学之人。东汉年间，又有陈元、范升今古文之争、何休与郑玄的今古文之争。而这些反对古文经学的人，也都不是利禄之人。光武任范升为博士，他却推荐梁恭和吕羌。《后汉书·范升传》记载：“二臣年并耆艾，经学深明，而臣不以时退，与恭并立，深知羌学，又不能达，惭负二老，无颜于世。诵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开口以为人师，愿推博士以避恭、羌。”范升曾仕于新莽政权，自认为学行不一，有愧于时贤，甘愿将博士之位让给他人。虽然范升的建议并未被光武帝所采纳，但这种推贤之心，可见一斑。范升被出妻诬告而下狱，其门人杨政敢于阻挡车架为他申冤，“武骑虎贲惧惊乘舆，举弓射之，犹不肯去；旄头又以戟叉政，伤胸，政犹不退”。（《后汉书·儒林传》）这样的行为，也非利禄之徒所能做出来的。

光武帝时，甚至有古文经学家营救今文学者的事例。光武帝时，大司徒欧阳歙因事下狱而死，“陈元上书追讼之，言甚切至，帝乃赐棺木，赠印绶，赙缣三千疋”。（《后汉书·儒林传》）欧阳歙为欧阳生之后，世传《欧阳尚书》之学，和称颂古文经学的陈元自然不是一家。欧阳歙被下狱而死，陈元极力上疏，使得欧阳歙能够顺利入葬，光武帝时，陈元与范升争论古文经学是否应立于学官，最终以光武帝同意立《左氏春秋》之学、但又不了了之而告终。倘若以利禄之争衡量这些学者，应当于理不合。

东汉中后期，又有李育和贾逵之争、何休与郑玄之争。李育少年游学太学，深好《公羊》之学，博览经传之书，得到班固等人的器重。建初元年，他因举方正而拜为议郎。贾逵自幼身处太学，不问人间世事。章帝都对此都颇为感慨，对马防说：“贾逵母病，此子无人事于外，屡空则从孤竹之子于首阳山矣。”可以说，李育和贾逵都非利禄之徒。何休作为《公羊》学者，反对《谷梁传》和《左传》。据《后汉书·儒林传》：“（陈）蕃败，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

诂》，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他作《春秋公羊传解诂》、《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完全是在陈蕃谋诛宦官失败、自己被废锢之后，可以说，他和博士利禄已经毫无瓜葛，若以利禄之争来评价他和今古文之争，也是有失其实的。

两汉经学今古文之争前后主要发生了四次，即成帝时刘歆与太常博士之争、光武帝时范升和陈元之争、章帝时贾逵和李育之争以及桓灵之间的何休与郑玄之争。〔3〕而这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不但不是贪图利禄之人，反而是能够精通经学大义的学者之宗。他们中还有不少人在政治变故中表现出一定的气节，值得称颂。因而，将今古文经学之争简单地归为利禄之争，恐不合史实。

## 2. 今文学者反对古文的缘由

今文博士反对古文经学，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

第一，师法的束缚。即刘歆所说“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汉书·楚元王传》）实际上，当刘歆提出将古文经立为学官的时候，儒生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即从道还是从师。一些较为通达的儒生，并不严格遵守师法，如翟方进虽然学习《谷梁》之学，但也颇好《左传》；刘歆早年学习《谷梁传》，但他认为《左传》的作者左丘明曾经见过孔子，应当更加了解孔子作《春秋》的意图，因而《左传》在表述《春秋》之义方面应当比《谷梁传》更为贴切。当时的大多数儒生，认为师法就是道的代表，所以尊道即是尊师。如孟喜《易学》师承田王孙，但又自成一家。他曾诈称自己得到老师的真传，后被同门梁丘贺揭发，因而不得立为博士；但他的门人白光、翟牧则被立为博士，由此建立了《孟氏》易学的博士地位。可见孟喜自成一家，是可以得到学者认可的，但他如果诈称自己所学为老师之说，那就要遭到学者的非议了。像孟喜这样自成一

家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儒生还是会遵循师法，不肯跨越半步的。在这样的学术风气下，刘歆突然提出古文经学之说，儒生必然不肯接受，他们在学理上是惟师法是从，绝对不肯接受新说的。贾逵批评刘歆未能和太常博士辩论《左传》大义优劣，就轻易移书太常，结果“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后汉书·贾逵传》）便是指责刘歆和今文经学家之间并没能讨论今古文经学的义理。然而，这在当时实属无奈之举，毕竟汉哀帝令刘歆和太常博士们讲论今古文义理，而博士“或不肯置对”，（《汉书·楚元王传》）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博士不愿接受刘歆的提议。在这样的情况下，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则使得他们惶恐不知所措，要么大家集体诋毁刘歆，要么就自己上疏乞骸骨了。然而，“或不肯置对”，毕竟还是有儒生乐于接受的，早年之翟方进、尹咸，以及稍晚的郑兴等人，便了解并接受了古文经学之说，这就在义理之争上打开了缺口。

第二，对政治的考量。秦汉博士，在其初设时，同政治关系十分密切，两汉博士热衷议政者不乏其人。博士对政治改革的建议，往往依附经义；皇帝的诏令及臣下的奏疏，也要援引经文。〔4〕因而，经学内部倘若出现分歧，势必会影响政策的制定。而今文经学内部，分歧颇多，莫衷一是。如前文所述，龚胜、师丹敢于触犯皇帝、太后，他们依据的，恰恰是自己平生所学的礼仪。也就是说，经书所载、先帝所立的礼仪，是他们愿意坚持的，即使代表最高权威的人试图侵犯，他们也要坚决捍卫。以这种观念看来，刘歆若要扶植“异端学说”，自然会引起今文学家的不满。汉章帝时，曹褒制定汉仪，结果遭到太尉张酺、尚书张敏等人的反对。其反对的缘由，也是因为曹褒所学为庆氏礼，与张酺等人并不相同。可见，今文诸家内部尚且不能调和，如果加入其他学说，只会使得矛盾更加激化罢了。范升曾上疏说：“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纷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后汉书·范升传》）便指出了学说纷争阻碍了政治决策。另外，设立古文经博士，还会导致诸家积极效法，提出异说，来争取博士的地位，“《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邹》、《夹》”，（《后汉书·范升传》）经学家法分化，诸家观点不同，拥立某家博士，必然还导致其他诸家的非

议，这对国家政治都是不利的。

第三，对学术的偏爱。如李育传习《公羊传》，又读《左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后汉书·儒林传》）肯定了《左传》的文学性，但同时指出，《左传》并没有反映《春秋》大义，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和《公羊传》相媲美的。李育甚至批评范升、陈元争辩《左传》，两人都引用图讖，“不据理体”，对自家学派的辩驳方式也颇为不满，于是根据《春秋》之义作《难左氏义》，由此可知，他对《公羊》义理的推崇，可见一斑。何休深好《公羊》之学，他见学者诋毁《公羊传》不及《左传》，而《公羊》学者的驳论又不得要领，于是专门做《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从学理对《左传》之学和《谷梁》之学进行反驳。这些都是学者醉心于家学之法的结果。

再观班固所说“利禄”的问题：“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汉书·儒林传》）考之历史，也有以经术和利禄相联系的例子。如刘歆曾嘲笑扬雄撰《太玄》说“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汉书·扬雄传》）肯定了利禄对于学术有一定的诱导作用。桓荣为太子少傅，颇受宠幸，感慨说：“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后汉书·桓荣传》）虽然肯定了学习经术可以得到皇帝的宠幸，但仍然以此作为诱导的方式，勉励后学勤于上进。由此可见，班固提出利禄是造成经学发展分歧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符合当时社会现实的，然而，班固没有将其作为今古文之争的直接原因。诚然，我们不否认博士及博士弟子中有因利禄而治学之人，但这些不能成为学术的主流，尤其这些人对于经学义理的发展，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而真正笃信经学，致力于学问的博士，却是从义理上反驳经学，这恰恰是经学发展的推动力。

以上几条原因，实际上反映了今文学者反对古文经学的几个不同阶段。刘歆最初提议设立古文经学之时，多数今文学者对古文经本身就是不屑于顾的，虽然他们知道有这样的经书存在，但并不传自师法，因此与自己无关。不过，既然刘歆移书指责太常博士，博士们必然不能无动于衷，只能集体诋毁刘歆，或是以乞

骸骨来威胁，作为消极的抵抗。然而，随着新莽时期古文经学的提倡，古文经毕竟还是流传开来，今文学者也就不得不去了解古文之说了。这一时期，今文学者便不能单单通过谩骂、威胁的方式来反对古文经学，更不能为了严守师法而不肯吸收古学之说——毕竟这是自己承认自己抱残守缺的表现。因而，以范升为代表的今文学者将重点放在治道方面，列出了设置古文博士的种种弊端。然而汉章帝仍凭借皇帝的权威，极力推崇古文经学，提升了古文经的地位，这样一来，以治道为由的反对，也就没有效果了，学者便退守至义理上，继续和古文经学相较量。这三个阶段，分别以三种不同的反对形式呈现出来，但他们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尤其是义理的分歧，始终是今古文之争的核心因素。既然是义理之争，就必然要了解双方的经学思想，这就使得更多的今文学者开始涉猎古学，从而为今古文经学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 3. 今文学者兼习古文之意义

早期的古文经学者，都是今文学家出身。虽然今文诸家多有反对古文经者，但仍有少部分学者，由于某些机遇，得以学习古文经学，从而为古文经学的传承，开启了先路。

第一，受诏令改习者。受诏改学其他学说，这一般决定于皇帝的意志，当然，皇帝的意志，往往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导向。如汉宣帝颇好《谷梁》之学，有学者提出，宣帝要改变汉武帝时期崇尚《公羊》学说的政治策略，用亲亲之道来取代大义灭亲的思想原则。〔5〕于是召开石渠阁会议，设立《谷梁》博士。宣帝征召刘向改受《谷梁春秋》，史有记载。汉章帝推崇古文经学，两次诏令博士弟子改习古文经学。据《后汉书·贾逵传》，第一次在建初元年：“令（贾）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明确提出从《公羊》学儒生中选拔人才改习《左传》。第二次在建初八年：“诏诸儒各选

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汉章帝的举措，使得一些精通今文家法的学者改学古文之学，这在客观上造就了一大批兼通今古文经学的儒者。根据《后汉书》的记载，追随贾逵学习古文经学的学者，有张衡、崔瑗、许慎、窦章等人，他们中不少人精通多家学说，尤其是许慎，曾撰《五经异义》，列举今古文学说的不同之处，又加按语，且其所论，有从古文学说者，也有从今文之说者，这可以视为经学融合的萌芽。史称马融常推敬许慎，则马融治学之风，可能受其影响。

第二，因个人喜好而改习者。根据个人喜好而重新择业，这在今文经学中已稍见其风。如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易》于孟喜，后见到韩婴一派的《易》学，便欣然受之。古文经学之所以得到重视，也都是由通达的今文学者力主提倡的结果。据《汉书·翟方进传》，翟方进早年学习《谷梁传》，后又兼学《左传》，还曾指导刘歆研究《左传》，可知其学问颇为精熟。郑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史称他“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自杜林、桓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后汉书·郑兴传》）这样的成就，可以说是东汉古文经学的一代宗师了。另外，《后汉书·丁鸿传》记载丁鸿跟随桓荣学习《欧阳尚书》，《儒林传》则记载杨伦跟随丁鸿学习《古文尚书》。如果史书记载无误，则丁鸿可能兼通今古文之学，但无其他史料，故而姑且存疑。不过，丁鸿在白虎观会议中“论难最明，诸儒称之”，人们称之为“殿中无双丁孝公”。（《后汉书·丁鸿传》）他的学问甚至超过了楼望、成封、桓郁和贾逵等人。由此看来，他兼通《古文尚书》，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早年生活于王莽政权而学古文经者。王莽一朝，曾设置《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左氏春秋》等于学官。这一时期虽较为短暂，其中受学之人，也难下定论，但新莽一朝对古文经学的推广，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如尹敏生活于两汉之际，《后汉书》本传说他“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又说“与班彪亲善，每相遇，辄日旰忘食，夜分不寝，自以为钟期伯牙、庄周惠施之相得也。”尹敏将自己和班彪的关系与古代贤人相类比，可以推知他年龄应当和班彪相当，或者稍长



于班彪。据《后汉书》本传可知，班彪卒于建武三十年，时年五十二岁，则班彪少年正当新莽政权之时，尹敏年龄与他相若，而且尹敏最初学习《欧阳尚书》，后来改学《古文尚书》及其他古文学，应当是新莽政权设置古文学的结果。

第四，游学之风的兴盛。汉代游学之风大兴，纵观《汉书》及《后汉书》，有过游学经历的绝不乏其人。刘太祥曾总结游学的职能，一是“拜学求师，丰富知识”，二是“广交师交，谋求名利”。〔6〕游学的儒生，有不少通达之士。杜林“好学沉深，家既多书，又外氏张竦父子喜文采，林从竦受书，渐渍内外，时称通儒”，（《后汉书·杜林传》）史书虽然未曾说他游学，但他先学自家之书，后又跟随外戚张竦学习经术，兼通内外家法，是没有问题的。马融起初学于四姓小侯学校，又从其父马严受业，后游学于挚恂门下，故博通经籍。郑玄早年受业于京兆第五伦，精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跟随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和《古文尚书》，后又游学马融，学习经术。根据这些学者的情况可知，游学的儒生，多没有严格的门户之见，乐于接受多家学说。这样的风气，是经学融合所不可缺少的。

学者传习古文学，虽然壮大了古文经的声势，增强了古文学的影响力，为经学的融合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尚不能直接促使经学融合。原因在于，但凡由出身博士之人，即使兼通多家学说，也不得不遵守家法，因而这些群体无法以融通的方式兼受各家学说。张玄因兼通《严氏春秋》和《颜氏春秋》，而未能被立为《颜氏春秋》博士；丁鸿兼学《欧阳尚书》和《古文尚书》，而各自教授，不肯将二者融为一体。由此可见，儒生中虽然有博通诸家之人，但这不代表他们治经兼用多家的学说。而不以博士为业的学者，却因不甚重视经学著述，往往不以传授经传为意。只有重视经术的传承，而又不局限于博士之业的学者，才能够将多家之学融为一体，这一工作需要通儒群体来完成。马融可以说是时代的骄子，他的博通之风，正好处在承前启后的历史环节中。所谓承前，是他继郑兴、贾逵之后，成为又一位经学成就颇高、影响颇大的学者，所谓启后，是说他培养的弟子如卢植、延笃、郑玄等，多有博通之风，经学正是在他的弟子郑玄手中，实现了完整意义上的融合。

< 參考文獻 >

-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3620.
- 皮锡瑞. 经学历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73.
- 周予同. 经今古文学[A].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14.
- 周予同. 博士制度和秦汉政治[A].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743-744.
- 陈苏镇. 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 2011：329.
- 刘太祥. 汉代游学之风[J]. 中国史研究, 1998（4）.

< Abstract >

The New Discussion on Struggle of the Studies of Confucian Classics  
of Current and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 in Han Dynasty

Hou, Shao-bo

Debate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could be viewed as the scholars' exclusion of different ideas. The scholars who studied present confucian Classics wanted to protect their tradition as well as keep the politic system stable. Therefore, the theme on debate of Confucian was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After Xin Dynasty, ancient confucian classics views were accepted by more and more scholars, which made it propagate rapidly. Therefore, Some ancient confucian classics scholars wanted to study both ancient confucian classics and present confucian Classics, which made the confucian classics have developed.

Key Words: Han Dynasty, Confucian Classics, Expert Confucian Scholar, doctors of Confucianism, the Style of Study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17. 04. 27.	2017. 05. 28.	2017. 06. 11.	2017. 06. 12.	2017. 06. 30.